



亲历审判战犯老台胞

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日前邀请92岁高龄的老台胞陈弘讲述参与对日本战犯审判的亲身经历。

陈弘为审讯工作做翻译，历时3年。他回忆说，这些战俘里有高级将领、伪满政府高官，也有普通的士兵。中国政府秉持人道主义开展认罪检举运动，感化作用显著。起先，很多日本士兵承认杀害很多人，但强调“这是上级下令，罪在上级”。慢慢地，“很多顽固的战俘改变了态度，受审时有战俘哭着说，‘我在中国所犯

的罪行几条命都不够偿还，没脸要求从宽处理’”。

本着“审判少数、释放多数”原则，除了45名罪行严重的战俘被判刑外，中国政府对其余战俘“免于起诉”，分三批遣回日本。他说，第一批战俘回到日本时被大批媒体包围采访。出人意料的是，他们中没有一人骂中国，反而感谢中国政府宽大处理，并表示余生将致力于推动中日友好关系。

这批日本战俘后来成立了“中国归还者联络会”，专门从事中日交流，并出版图

书揭露日本侵略者在华暴行。陈弘提到，中国曾于1956年派出一个代表团赴日，当时两国并未建交，联络会主动成立纠察队保护中方团员安全。1988年，该会还集资在抚顺建立一座“向抗日殉难烈士谢罪碑”，表达谢罪、感恩之情。

“担任战犯审判翻译工作的经历，让我深刻地感觉到，我们真的当家做主人了。直到现在，想起那时的事，我仍然会很激动。这是我人生中光荣的一笔。”他说。

(据新华社电 记者 赵博)

掠夺粮食 滥杀平民 笠实笔供提要

据笠实1954年11月笔供，他1906年生于日本福冈县，华名李实。1939年来华，曾任伪山西省临汾县公署财务辅佐官、壶关县政府顾问等职。

重要罪行有：

1943年11月25日—1945年8月15日，“我任壶关县政府顾问时，因为收夺食粮和轻重工业原料，饿死了该县的和平居民150名”。“掠夺了一城和58个村的谷、高粱、小麦、玉米等食粮，合计1087万斤，羊毛约8000斤，羊皮约500张，牛皮约30张”。

1944年6月—10月，“讨伐壶关禾登村。……作战中在该村杀害指导员1名和民兵10名”。

1945年2月，命令壶关县长进攻土河村，“杀害了该村民兵18名”。同月，命令进攻刘寨村，“将该村村民14名烧死在一个房屋内”。

1945年3月，命令部下“讨伐壶关三王头村”，“日军用轻机枪扫射，射死了和平居民19名”。

据神野久吉1954年11月笔供，他1908年出生于日本爱媛县。1941年3月参加侵华战争，曾任伪大同省公署直轄警察队首席指挥官，阎锡山大同保安总队少校部附。

重要罪行有：

1941年6月13日，在平谷县执行“警戒行动”中，

投放毒气 奸污妇女

神野久吉笔供提要

“逮捕约20名村民禁闭在窑洞里，投入了两个喷嚏性瓦斯，并在外头监视禁止外出共约15分钟左右的时间”。

1942年9月13日，“在平鲁县二墩南方2公里半的某村，对一位35岁左右的农民妇女”，“在她的家屋内将她强奸了”。

1945年6月7日，在广灵县南土岭村，“有一位25岁左右的农民妇女在看护着她丈夫的病，又有一位28岁左右的农民妇女给她在一起，在厕所的一角同时将其强奸了”。

“我在日本军时代，杀人17件177名”，“强奸24件24名，强奸未遂5件5名，逮捕10件24名”。

据武部六藏1950年笔供，他1893年出生于日本长崎县。曾任伪满洲国总务长官。

重要罪行有：

“满洲的第一次产业开发5年计划的制订是在1937年完成的。”

“实行满洲产业开发计划只靠满洲国自己的力量究竟是不可能的，大部分必须靠日本援助。所以对该计划的制订是和日本政府及军部作了充分的商议。”

“1939年修正了第一次计划，扩大了第一次计划的规模。……这是和日本政府及军部共同商议后确定

伪满总务 祸害东北

武部六藏笔供提要

的。修改计划的中心人物还是星野直树和岸信介。”

“接着第一次计划又制订了第二次开发产业计划。它是在1942年制订的”。“制订第二次计划是在我任总务长官的时期，古海忠之、青木实是制订计划的中心人物。关东军方面主要参加指导的是第4课小尾中佐。”

据古海忠之1954年3月笔供，他1900年出生，东京都人。1932年7月参加侵华战争，曾任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厅长计处特别科长、处长、经济部次长、总务厅长兼企划局局长等职。

重要罪行有：

1936年7月，“参加关东军和政府主持的有关日本开拓民200万人口户植计划的会议。参预决定本计划。”

1936年9月，“参加数次关东军和政府主持的制订开拓5年计划的会议。参预决定该计划。”

1937年10月，“屡次参加关东军和企划处主持的有关10年鸦片断禁政策的会议。参预审议，建议缓和禁烟方案并表决该政策。”

1943年4月，“批准在奉天、吉林和四平的原地区栽种鸦片的试验圃。以后力图扩大。”

1945年4月，“向华中汪政权卖了鸦片10万两”。

种卖鸦片 阻碍禁烟

古海忠之笔供提要

让罪恶昭然天下 让历史警示世人

——日本战犯的侵华罪行自供①⑥—②②



▲被告人神野久吉在特别军事法庭上作最后陈述(资料照片)。

新华社记者 张瑞华摄

▼图为1956年特别军事法庭在沈阳开庭审判时的情形。(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据齐藤美夫(即斋藤美夫)1954年8月笔供，他1890年出生，日本东京人。1929年4月任日本关东宪兵队长长春分队长，华南日本派遣宪兵队长，伪满洲国陆军少将、宪兵训练处处长等职。

重要罪行有：

1939年8月8日，命令部下“在山海关交接河北押解部队自河北押解来的中国人90名押解到孙吴。将其中30名留在哈尔滨交石井部队人员，所余送孙吴石井部队。”1956年6月17日，他在订正、补充笔供中称，“根据白滨大尉的事后报告知道了被送人员30名是在哈尔滨下车供给石井部队作细菌学活体实验，60名是在孙吴下车供给立志野学校(瓦斯部队)与石井部队协同进行的毒瓦斯效能实验特别演习之用”。

1941年6月—1942年6月，“先后3次命令广东宪兵队将逮捕的中国人以严重处分进行集体屠杀(枪决)”，“约达120名”。

“731”爪牙 屠杀平民

齐藤美夫笔供提要

据中井久二1954年8月—11月笔供，他1897年出生，日本鸟取县人，1936年后，先后任伪满洲国锦州地方法院审判员、司法矫正总局局长等职。

重要罪行有：

1938年—1944年止，“于监狱里所死亡的已决犯及未决犯总数如下：1938年约有6000名，1943年约有18000名，1944年20000名，每年出入(关押和释放)监狱的犯人总数是20万人，

伪满法官 建慰安所

中井久二笔供提要

(估计)死亡率达为上述总数的30%到100%。”

1939年5月，“为了设立慰安士兵的妓院，而以3万元建筑一所房子(约200平方公尺)，把这房子借予出去，援助了日本帝国主义军队”。

1941年7月17日—1945年8月15日，“奉天第一监狱伪满洲国奉天医科大学的要求，把在监狱内死亡而没有人取的数百名收容者的尸体送交该大学，供其解剖。”

疫菌帮凶 屠杀抗联

三宅秀也笔供提要

据三宅秀也1954年8月—1955年4月笔供，他1902年出生，日本兵库县人。曾任伪满洲国热河省警务厅警务科科长、伪奉天省警务厅厅长。

重要罪行有：

1936年，伪热河省、伪锦州省逮捕了共产党员及有反满抗日思想的中国爱国者达7066名，内“严惩”(死刑)150名。

1938年11月，召开防疫本部会议，“……石井部队在农安县城将在伪警察包围下的人民供对鼠疫病菌的研究和实验之用。”

1939年9月—1941年3月，指导下各伪警察机关协助“消灭”抗日联军第一路军，共射杀抗日联军约20名，诱扣约1500名，其中包括杨靖宇、陈翰章等人。

1944年7月—1945年8月，在任伪奉天省警务厅厅长时，下令属下逮捕违反刑法者，“仅在1市6县即逮捕中国人民13180名，……移案伪检察厅者有14名被判处死刑，在监狱中被屠杀”。

(中央档案馆7月18日至24日公布，本报有删节)

2003年8月12日早上，一个约70岁的日本老人来到齐齐哈尔市政府，对接待人员说：“我知道还有一批毒气弹埋在哪儿，是我亲手埋的。”

在这一年中曾发生过“8·4”日军遗留毒气泄漏伤人事件的齐齐哈尔市，曾是日军化学武器部队——516部队和526部队的大本营。战败后，日军曾把大量化学武器就地掩埋。根据原齐齐哈尔社科院院长曹志勃等人搜集的数据，在中国，当时日本军遗留了大约200万枚毒弹。

上世纪20年代，日本政府看上了一块可用于秘密生产毒气的“风水宝地”——大久野岛。后来，日军开始建造生产设施，主要包括位于岛西北面的长浦工厂及三轩屋工厂，并以兔子为试验品测试毒气效果。由于毒气工厂涉及军事机密，大久野岛一度被从日本发行的地图上抹去，所以大久野岛又有“从地图上消失的岛”之称。

侵华日军大肆实施毒气战

遗弃大量毒气弹 至今仍在伤害中国平民

本报记者 陆培法

日本侵华战争开始后，大久野岛上毒气工厂的规模迅速扩大，各类人员最多时达5000人，可以生产装备日军的所有化学毒剂。据记载，大久野岛共生产3600吨毒气弹，其中3000吨运往中国战场。到1945年，大久野岛制造的化学毒剂占当时日本所有化学毒剂产量的近90%。

根据最近由日本学者编著的《十五年战争机密资料集——毒气战相关资料》记载，对于推动化学武器研制与生产，当时的日本军部和政府难辞其咎：首先是设置、组织“临时

毒气调查委员会”。其次是组建化武研究与生产机构。

据查，仅从1925年至1945年日本就进行了56次化武实验，其中在中国境内进行了17次。该书收录的由大本营颁布的与毒气战相关的命令和指示有24件，均是由大本营陆军部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亲王及其继任者杉山元、东条英机下达的。

自1937年10月起，日军相继在北平、上海、山西数次投放毒气弹，造成中国军民几百人中毒，呕吐不止，竟至毙命。1938年8

月，日军上层编写了《毒瓦斯用法及其战例》、《特种发烟筒用法及其成果利用法》、《徐州会战、安作作战特种烟使用战例及成果》等书，分发给各级指挥官，借以指导各部实施化学战教育；并在太原、宜昌、南京、汉口、广州等处设立毒气制造厂和化学武器装配厂，在上海、宜昌、太原等地驻扎专门实施毒气战的部队，有野战瓦斯队、迫击大队和步兵临时发烟部队。

曾在516部队服役的高桥正治和若生重作回忆，1945年8月13日下午3时，他们所在的部队接到命令，在3天内把库存的毒气弹全部投入嫩江中。高桥等五六个人将装箱的毒气弹用汽车运到嫩江江桥上，抛入江中。

到目前为止，中国十几个省、自治区、市30余处发现了日本遗弃的化学武器，大部分集中在东北。据初步统计，中国各地受到日军遗弃毒气及炮弹伤害的已超过2000人，仅在中国东北地区的就超过千人。

